



圖1 大英博物館外觀 朱龍興攝於2014年



圖2 大英博物館中庭 朱龍興攝於2014年

民有、民治、民享——國家博物館的時代角色

鄭邦彥

一八六三年，美國總統亞伯拉罕·林肯（Abraham Lincoln, 1809-1865）發表〈蓋茲堡演說〉（Gettysburg Address），以「國家為人民所擁有，被人民所選出，為人民而服務，永續於世」（of the people, by the people, for the people），揭櫫當代民主政治的真諦。（註一）回顧西歐博物館發展歷程，民有、民治、民享——也成為國家博物館（national museum）的核心價值之一，如何為觀眾提供適切的公共服務，並帶來有意義的博物館經驗，進而釐清其時代角色，以找到可行的實踐策略，刻不容緩。本文以此為起點，一方面梳理西歐「博物館作為公共領域」的思潮淵源，進而探究國家博物館與公共性的內在連繫，同時，以二〇一五年大英博物館（the British Museum）（圖一、二）新徵集的「拉姆培杜薩十字架」（the Lampedusa Cross）為案例，說明國家博物館的時代角色及其實踐。

原典倡議：博物館作為公共領域

「公共領域」（public sphere）的原典，最早由漢娜·鄂蘭（Hannah Arendt, 1906-1975）提出，尤爾根·哈貝馬斯（Jürgen Habermas, 1929-）加以闡揚，隨

後引發廣泛討論，儼然成為不同領域學界的靈感泉源與倡議基礎。

一九五八年，鄂蘭出版《人的處境》（Arendt: 1958, 林宏濤譯，二〇一六）一書，在《公共領域：共同事務》一節，指出「公共」指稱兩種互關連又不完全等同的現象。其一，

過轉型、去私人化、去個別化（transformed, deprivatized and deindividualized），始具有適合於公共顯現的形式，最常見的轉型是發生在說故事和個人經驗於藝術的異位（artistic transposition）裡。其一，「公共」也意指世界本身，將人們由私人處所中區隔出來，而「一起共處於世界」，本質上像是一張把人們聚攏在一起的桌子，讓人們既相互聯繫，又分開了彼此。鄂蘭同時

強調行動（與關係網絡）、藝術作品（與世界的恆久性）等概念的連繫，私與公接合的關鍵在於，透過說故事或藝術的轉型，構成我們共處的世界（公共），此接合不僅是透過藝術轉型成為實體，更是一種變容（transfiguration）的歷程；藝術作品源於人類的思想能力，但不會自然產生，直到它合適進入世界時，始被實體化而存在。此時，藝術家（詩人、歷史學者、紀念碑

建造者或作家）扮演關鍵的角色，將表現在行動和言說中的思想，加以轉型，否則思想就無法流傳下去。

一九六二年，哈貝馬斯於《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》（Habermas: 1962, 曹衛東等譯，二〇一〇）一書，針對歐洲十七、八世紀男性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，提出論述，相對於「私人領域」（private sphere），「公共領域」係指介於國家與社會間的公共空間，並假定公民能於此空間理性溝通，參與討論關乎公眾利益的事務，進而形成輿論，得以對理性化的國家權力和政府運作，進行監督。哈貝馬斯在該書〈公共領域的諸種機制〉一節，詳述資產階級公共領域，如何由私人集合逐步轉化，直到具有公共性的歷程，此時，城市取代宮廷，咖啡館、沙龍成為新興公共領域，劇院、博物館和音樂廳也是公共領域之一。隨後，哈貝馬斯再以「生活世界」（life world）與「體制」（system）兩概念，進一步論述現代社會結構，勾勒生活世界逐漸體制化的樣態，最終，以「生活世界殖民化」（colonization of the life world）指出現代社會體制化後的困境。（阮新邦，一九九九）有別於鄂蘭，哈貝馬斯將公共領域定義為「公共論壇」，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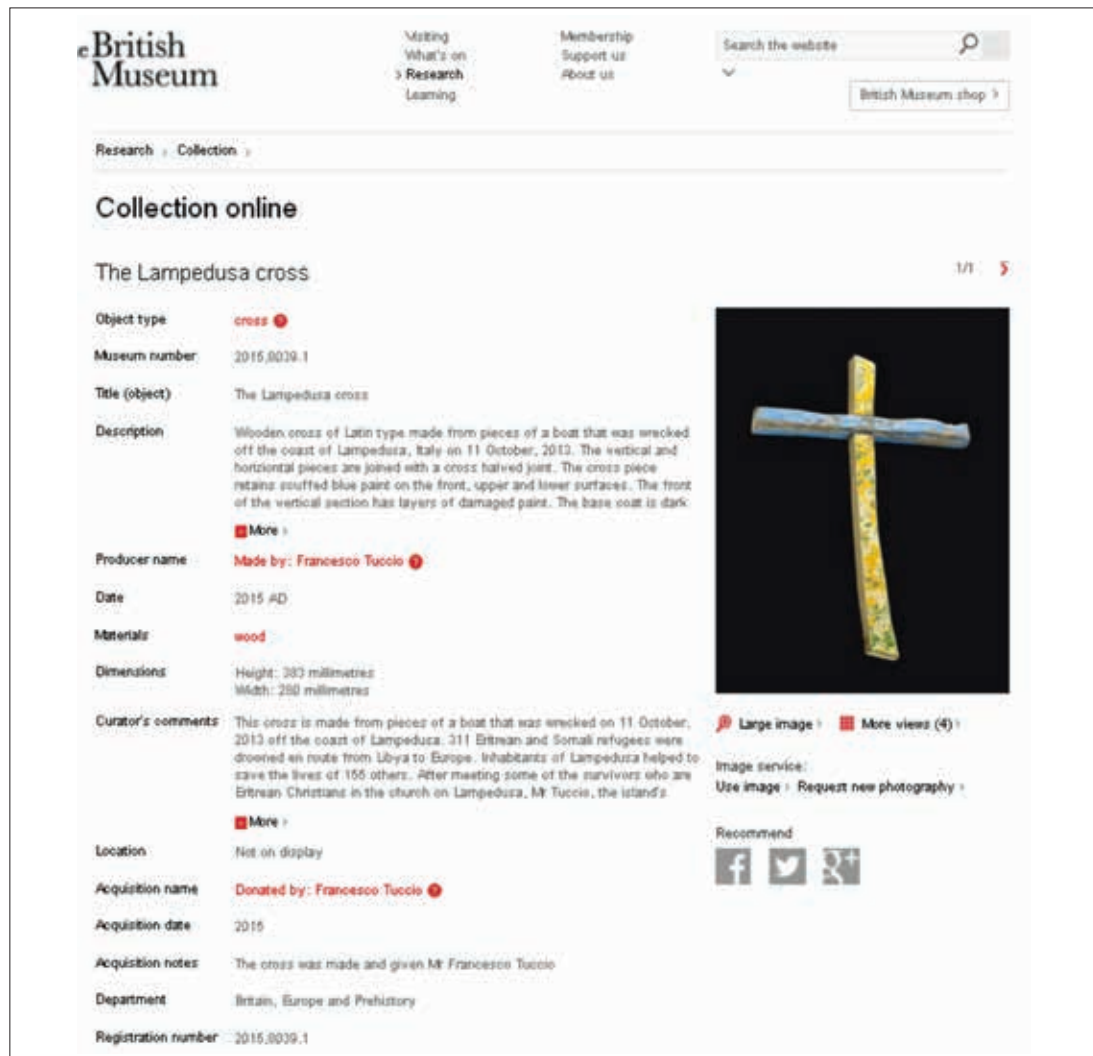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大英博物館線上典藏「拉姆培杜薩十字架」網頁 ©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
網址：http://www.britishmuseum.org/research/collection_online/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.aspx?objectId=3691920&partId=1&searchText=cross+lampedusa&page=1，瀏覽日期：2017年3月28日。

「拉姆培杜薩十字架」透過圖斯的手工藝，具體成形、轉化為物件，濃縮這個世代的集體經驗和生活情感，有偷渡難民對更好生活的企盼、時人對罹難者的追思和對倖存者的關懷，也隱含了難民危機所帶來的結構性社會問題，還有歐盟諸國不同回應之道及其挑戰。該十字架入藏後，由「史前時代、歐洲與英國」部門（Department of Britain, Europe and Prehistory）典藏，

年十月被大英博物館永久典藏。該十字架是大英博物館前館長尼爾·麥格雷戈（Neil MacGregor, 1946-）卸任前為博物館徵集的最後一件藏品，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卸任當天公開展示。（圖四）麥格雷戈館長表示：圖斯所捐贈的十字架向博物館觀眾，反映一個歐洲當下歷史的關鍵時刻，期待藉此改變觀眾對這波大規模難民潮的理解方式。此件十字架的入藏，亦標舉大英博物館的公共定位，一如館長卸任感言強調，「博物館所致力於履行其設立的初衷——一個世界的博物館，為了世界和現在及其未來。」（註三，原文為：“...All have enabled the Museum to fulfil the purpose for which it was set up: to be a Museum of the world and for the world, now and well into the future.”）

此「私人」得以「會合」，成為公眾；會合意指媒體的中介和銜接，透過「事件—議題—論壇」漸次成形，其關鍵在於理性溝通（意指私人在溝通行動中，互為主體的彼此觀照與對焦），於此基礎上形塑「公共意見或輿論」；公共意見或輿論，必須透過「公共權威」加以落實，公共權威是特定的集體行動，主要指向（但不侷限於）國家（the state），也包括工會與社區協會等。（李丁讚，二〇〇四）

鄂蘭對公共領域的原典論述，側重於哲學思辨層面，有別於哈貝馬斯以理性溝通為基礎的論述。哈貝馬斯對資產階級公

在博物館，被看見的公共性

二〇一三年十月三日，一艘由利比亞（Libya）前往歐洲，滿載來自北非偷渡客的難民船，行經義大利南方拉姆培杜薩島（Lampedusa）外海時，失火沉沒，造成來自厄利垂亞（Eritrea）、索馬里（Somalia）三二一位難民罹難，在該島居民救援下，另有一一五位難民幸運生還。身為木匠，

共領域的歷史考察，集中在十七、八世紀歐洲，雖將「博物館」視為公共領域之一，未經歷史考察，實屬倡議性質。



圖3 拉姆培杜薩十字架 高38.3·寬28公分 ©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



圖4 「拉姆培杜薩十字架」於大英博物館展場 ©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

也是島民的弗朗切斯科·圖斯（Francesco Tuccio），與生還者接觸後，對他們的處境深有所感，希望能為他們做什麼？圖斯所能想到最好的方式，就是利用他的手工技藝，將船艙甲板殘骸改製為一個個十字架，不僅紀念難民的苦難，也期待帶來希望。稍早，同年七月八日天主教教宗方濟各（Pope Francis, 1936-）首度以教皇身份出訪，率先來到此島，特別在為所有罹難者主持的彌撒中，手持類似的十字架，追思亡者，以茲感念。（註二）

「拉姆培杜薩十字架」（圖三）是圖斯所製作的十字架其中之一件，二〇一五



圖8 「拉姆培杜薩十字架」置於聖保羅大教堂彌撒祭臺 Photographs by Graham Laddao, © The Chapter of St Paul's Cathedral.

回顧西歐博物館發展史，以十八世紀公共博物館（public museum）的出現，作為討論「博物館作為公共領域」的起點，可知：哈貝馬斯的論述與實際發展脈絡，或有出入。此時，思想面以啟蒙運動成就了西方的世界觀與知識論，政治面則

誰的公共性：國家博物館的反身性實踐

觀眾聚集在一起的公開場域，每個場域裡，有不同的策展主體（包括：以策展人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展覽主軸、選件和詮釋，以及展覽設計和配套的教育活動、文宣品等，都是策展主體的載體），訴說不同的時代故事。更重要的是，展場中觀眾與策展主體的關係，一如鄂蘭的比喻，「本質上就像是一張把人們聚攏在一起的桌子，讓人們既相互聯繫，又分開了彼此」，意即策展選件在這桌子被看見的同時，觀眾聚合在展品（桌子）周遭，也凝視了彼此——一個我們和他者（Others）差異共存的世界。總之，博物館體制，旨在透過藏品及其策展機制，創造「被看見的公共性」。

點燃了將皇室珍藏「向全民開放」的風潮，造就以百科全書式藏品（encyclopedic collection）為基礎的國家博物館出現，以法國羅浮宮（Musée du Louvre）最具代表（Duncan, 1995），另一案例則是上述的大英博物館——全世界第一個國家博物館，成立於一七五三年。然而，在「向全民開放」的彼端，則是國家霸權以帝國主義之名的擴展。班納迪克·安德森（Benedict Anderson, 1936-2015）在《想像的共同體：民族主義的起緣與散布》（吳叡人譯，一九九九年）一書，梳理當時西歐各國如何透過族群的想像，建構國家的樣貌，並在《人口調查、地圖、博物館》末章，指出（當時）博物館成為民族主義、國族主義的載體，是殖民者研究殖民地文化的展示工具，成為征服的標誌。故在西歐博物館初次展現的公共性，是一種「向全民開放」教化民眾的形態，實非鄂蘭所言「被看見的公共性」；此時的博物館，也不是哈貝馬斯論述「經會合而成公共論壇」的場域。

隨著博物館學的持續發展，與時俱進，林恩·蒂徹（J. Lynne Teicher）倡議當代的博物館研究，正轉向「反映中的反身

見的可能。之於博物館，私人生活裡的經驗、情感和記憶，往往濃縮於物件中，這些物件經過時間揀選，一旦成為博物館典藏品（即相當程度地轉私為公）後，方具有公共顯現的潛力。其二，博物館透過「策展」及其配套教育活動，催化了藏品所隱含的公共性，賦予「被看見」的具體形式。透過策展機制，博物館創造出一個個「將

登錄號為「2015.8039.1」，隨後公開展示，在大英博物館線上藏品（Online Collection），也能透過網際網路檢索和瀏覽。（圖五）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九日，十



圖6 「拉姆培杜薩十字架」於聖保羅大教堂 Photographs by Graham Laddao, © The Chapter of St Paul's Cathedral.



圖7 「拉姆培杜薩十字架」於聖保羅大教堂 Jill Maggs佈展 Photographs by Graham Laddao, © The Chapter of St Paul's Cathedral.

字架被借出，由博物館登錄員吉兒·麥格絲（Jill Maggs）負責，運送至倫敦聖保羅大教堂（St. Paul Cathedral），在教堂舉辦難民週（Refugee Week）轉為彌撒禮儀中，象徵苦難、愛與救贖的聖物（圖六~八），英國廣播公司第四臺（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, BBC Radio 4），另有專訪介紹。（註四）

大英博物館徵集政策（British Museum Policy: Acquisition of Objects for the Collection），相當程度宣示了該館對公共性的定義，促成「拉姆培杜薩十字架」順利入藏。大英博物館的「徵集目的，在於（其一）保持或增進世界文明在文化及歷史上的紀錄，包括：新近出土、理解有限或尚待探索的人類歷史和經驗；（其二）透過藝術、物質文化呈現對當下的影響，進而促成過去與現在之間的公共旨趣（public interest）；（其三）對現有觀眾提供啟發靈感和娛樂的新路徑，並創造新的觀眾群；（其四）為不同文化、國籍、種族及信念的人群，倡議相對友善的關係。」（註五）此徵集政策，跨越博物館為單一國家服務的邊界，隱含其兼具「寰宇博物館」（universal museum）的公共屬性，擴展了其作為國家博物館的新定位。再者，關鍵在於：博物館公共性不會自我展現，有賴藏品透過策展公開展示，與觀眾經驗會合後，始得以被揭露，兩者缺一不可。

以鄂蘭的論述，博物館實踐公共性的策略，在於：其一，私人生活中內蘊公共性，惟有透過合宜轉化，公共性始有被看

Museum) (圖十一) 等重量級國家博物館 (尚有如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、芝加哥美術館和克里夫蘭美術館等明星級私立博物館)。這些博物館共通性在於：在過去歷史情境中，擁有量多質精的百科全書式藏品，雖已透過「向全民開放」服務來自全球的多元觀眾，但回到鄂蘭、哈貝馬斯的原典論述，「這是『誰』的公共性」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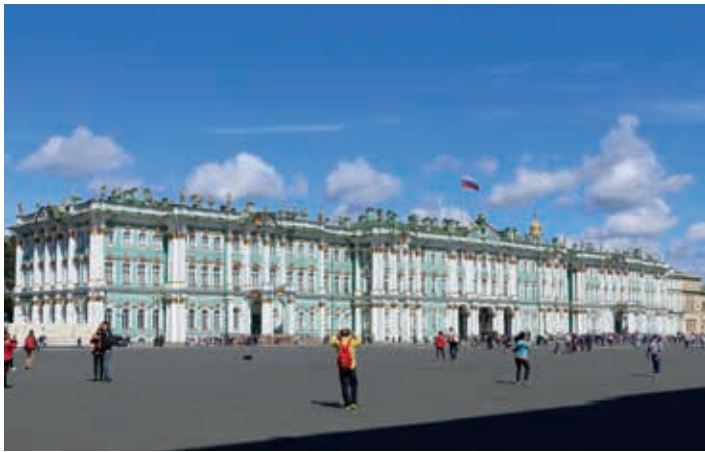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1 國立冬宮博物館外觀 巫伊婷攝於2017年



圖9 羅浮宮外觀 王淨雯攝於2017年



圖10 荷蘭國家博物館外觀 陳怡蓁攝於2017年

性實踐」(Museum studies: reflecting on reflective practice) 方法論，揭露博物館從來不是一個中立的機構，要求博物館正視，並反省自身所擁有的權力，持續深化博物館對其自身公共性的體認。(Teather, 1991) 詹姆士·克里弗德 (James Clifford, 1945-) 在〈作為接觸地帶的博物館〉(Clifford, 1997) 一文，有深刻反省，他首先

反思 (人類學) 博物館初期體現了殖民者的特殊想像，所再現的被殖民者歷史和文化，多有侷限。於此反思下的博物館，不再是協商或研究的場所，也非邊界，而是如瑪莉·路易絲·普拉特 (Mary Louis Pratt, 1948-) 所定義的「接觸地帶」(contact zone)，意即「當博物館被視為是『接觸地帶』時，以其典藏品作為的組織結構，

「『誰』來定義公共性」，實為更應深究及批判的主題。

若同意將當代的博物館研究，視為是一種「反映中的反身性實踐」，任何一個國家博物館必需有勇氣和巧思，來面對「公共空間裡的暴力過去」(Teher, Milton & Patterson, 2011)，甚至是當下博物館治理決策，亦要有接受公評、調整的雅量。「寰宇博物館」理念的提出，或許相當程度化解了歐美國家博物館的前身，多半具有暴力過去的陰影，但是國家博物館如何常保「這是『誰』的公共性」之自我批判及其轉化，才是更重要的關鍵。

理想的國家博物館公共角色

再以哈貝馬斯 (公共領域 vs. 生活世界和體制) 的論述，細論 (傳統的) 博物館體制，係以藏品為核心，進行一連串的藏品維護、營運管理、詮釋與溝通等活動，漸次建構博物館蒐藏、策展等體制化的體系及其運作機制，最終，創造出博物館觀眾與館員並存的生活世界。然而，以公共領域作為博物館的理想型態，依此所

將被轉變成為一個持續發展的歷史、政治與道德之關係，也是一種進退並存的權力交換體 (a power-charged set of exchanges, of push and pull, Clifford, 1997: 192) 。

面對此權力交換體，為數不少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博物館，試圖以「寰宇博物館」此一理念找回自我的公共定位，對大英博物館而言，更是刻不容緩的議題。二〇〇二年，由麥格雷戈時任大英博物館館長所起草，有歐美十八個博物館聯名發表〈寰宇博物館聯合聲明〉(Declaration on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Museums)，宣示「博物館作為文化發展的主體，旨在透過持續性的再詮釋程序，深化知識的內涵。每件藏品皆對此程序有所助益。任何窄化藏品的多元及其多重面向，皆會中止對所有觀眾的服務」；再者，承認藏品在目前所被蒐藏的國家和其原生的國家，皆有價值，必須以不同的敏感度，加以檢視，並不應侷限於藏品歸還——此單一焦點上。(註八) 參與聯合聲明的博物館，除大英博物館、法國羅浮宮 (圖九) 外，其中不乏如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(Rijksmuseum) (圖十) 和蘇聯聖彼得堡國立冬宮博物館 (The State Hermitage

建構的生活世界，關鍵在於「博物館可否借用公共領域的定義與組成要素，自我檢視，包括：博物館能否以『私 (人領域)』的藏品為基礎，形塑『公 (共領域)』的可能？博物館如何透過策展建構論壇，進而『會合』公眾的能動性，扮演『公共意見』的催生角色？最終，由其體制運作形塑『公共權威』的主體性？」若上述諸提問成立，進而反思，在博物館裡生活的館長、管理藏品的研究員 (curator)、登錄員 (registrar)、維護員 (conservator)、及其策展團隊、導覽教育人員 (educator) 和支援服務的志工 (volunteer) 等，他們的生活世界為何？又，這群人共同為博物館以藏品為核心的一連串活動裡，是否透過策展形塑一個與觀眾「會合」的生活世界，進而構建「論壇」？此論壇是否存在？建構論壇的條件為何？

國家博物館作為博物館的諸多類型之一，其所建構的論壇背後之公共性，除透過策展自我揭露、展示於觀眾面前外，無可迴避的是，國家博物館如何跳脫為單一國家服務的邊界，以民有、民治、民享——國家博物館的成立初衷，辨識其中「『民』



圖12 國際博物館日2017年主題海報
©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

所指為何」(包括：服務對象是觀光客、國人、原住民、新住民或網眾；具文化資本的觀眾、潛在觀眾或非觀眾；學童、家庭或樂齡觀眾；身心障礙或性別少數等差異觀眾群體，且觀眾身份往往多重、流動，如來自國外樂齡觀光客、新住民家庭觀眾等，與其對博物館的具體需求為何等面向)，以為視框，持續自我批判，方能避免「博物館生活世界殖民化」的困境。

進入廿世紀，多元文化主義 (Multiculturalism) 思潮興起，為回應博物館發展初期，以策展再現國家意識形態的質疑，一九八九年，史蒂芬·拉文 (Steven D. Lavine, 1947-) 在〈博物館與多元文化

主義：由誰主控？〉一文，指出(博物館)「無論主題為何，總不免帶特定的文化前提及策展人所擁有的資源，即在強調一方的同時，將其他漠視，此前提將不同文化、時空脈絡與展覽類型視為不同，……此特點使得展覽成為被爭論的地界 (a contested terrain)，……若博物館社群持續探究此多元文化與跨文化間的地界，或許博物館將可扮演在反映、協調多元群體宣稱時的重要角色，以協助國家建構一個新的主張。」(Lavine, 1989: 36, 42) 此見解，正與今(二〇一七)年國際博物館日 (International Museum Day) 的主題——「博物館與爭議性歷史：在博物館表述難以言說的故事」(Museums and contested histories: Saying the unspeakable in museums) (圖十一)，遙遙呼應。

進入全球化 (Globalization) 時代，此一名詞已對國際體制重新定義 (Friedman, 2000)，對博物館也不例外。全球化透過國際網路，為博物館帶來跨國界的觀眾 (Muller, 2003)，其中，以如何借助「博物館作為接觸地帶」的能动性，翻轉國家的霸權體制，實為其急待面對的時代挑戰之

一。此時的博物館透過藏品及其策展，化為「進退並存的權力交換體」，建構一個開放、安全與包容的公共領域，讓觀眾跨越身心障礙、國家族群、階級與性別、文化資本等諸多差異，重新體驗「一個持續進行的歷史、政治與道德之關係」，始有機會將眼光由過去，朝向共同的未來。

這個未來，早在一九六七年莫莉·哈里森 (Molly Harrison, 1909-2002) 的眼中，將視「博物館是奇怪的邊緣地帶，論及教育，他們並非學校；論及研究，它們並非大學；論及價值，它們並非商店或銀行；論及治療，它們並非醫院；論及休閒娛樂，它們並非遊樂場。如果博物館有意做到，博物館可以提供不同社群的各種需求。」(Harrison, 1967: x) 之於國家博物館，此景像應非「如果博物館有意做到」，而是「該當做到」，與時俱進，產生差異並存的多元樣貌。

若民有、民治、民享是國家博物館的成立初衷，公共性則為國家博物館與生俱來的基因，並在特定時空情境中，不斷實踐、演化、派生。是故，當今的國家博物館，應是一個兼具殿堂與論壇雙重性格的公共

空間，如何為不同類型的多元文化觀眾，跨越國族主義，提供適切的公共服務，並帶來有意義的博物館經驗，在主流社會成為與少數、弱勢族群之間，彼此平等接觸、

交流與對話的實踐場域，正是國家博物館的時代挑戰，並在面對挑戰中重塑其時代角色。

後記：本文原始概念形構於鄭邦彥 (二〇一〇) 一文，承蒙本刊主編余佩瑾處長邀稿，增列國家博物館相關論點，加以擴充。撰稿時，曾與本院前輩諸君和院外同行討論。(雖未具名) 由衷致謝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

註釋

1. 〈蓋茲堡演說〉完整介紹，請參考美國國會圖書館 (Library of Congress) 專屬網頁，線上展示中有該演說不同版本手稿。瀏覽日期：二〇一七年三月廿九日。網址：https://www.loc.gov/exhibits/gettysburg-address/。
2. 姆培杜薩島距北非突尼西亞 (Tunisia) 不到一三三公里，成為難民前往歐洲的轉接站。據聯合國難民署 (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) 統計，自一九九九年，至少超過廿萬的難民，行經該島轉至歐盟各國。本報難相關報導，請參考《衛報》(The Guardian)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日新聞。瀏覽日期：二〇一七年三月廿九日。網址：https://www.theguardian.com/world/2013/oct/03/lampedusa-boat-tragedy-italy-migrants。有關教宗方濟各親訪姆培杜薩島，為難民祈福和慰藉等報導，請參考聯合國難民署，美國有線新聞網 (Cable News Network, CNN) 二〇一三年七月八日新聞。瀏覽日期：二〇一七年三月廿九日。網址：https://www.unhcr.org/news/atext/2013/7/51dad8d86/pope-francis-prays-migrants-refugees-during-landmark-visit-italys-lampedusa.html，http://edition.cnn.com/2013/07/08/world/europe/pope-lampedusa-refugees/index.html。
3. 該段感言，引自大英博物館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官方新聞稿。瀏覽日期：二〇一七年三月廿八日。網址：http://www.britishmuseum.org/about_us/news_and_press/press_releases/2015/macgregors_last_acquisition.aspx。
4. 請參考倫敦聖保羅大教堂官網 (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九日)。瀏覽日期：二〇一七年三月廿八日。網

- 址：https://www.stpauls.co.uk/worship-music/workship/read-sermons/sermon-preached-at-sung-eucharist-trinity-sunday-19-june-2016-by-the-revd-canon-tricia-hillas-pastor。亦請參考英國廣播公司第四臺，二〇一六年六月廿日廣播新聞。瀏覽日期：二〇一七年三月廿八日。網址：http://www.bbc.co.uk/programmes/p03yxf94。
5. 大英博物館徵集政策 (二〇一三年版本)，下載自大英博物館官方網站。瀏覽日期：二〇一七年三月廿八日。網址：https://www.britishmuseum.org/pdf/Acquisitions%20policy%20July%202013%20FINAL.pdf
6. 該段宣言，下載自《國際博物館協會簡訊》(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, ICOM News)，二〇〇四年第一期，頁四。瀏覽日期：二〇一七年三月廿九日。網址：http://icom.museum/fileadmin/user_upload/pdf/ICOM_News/2004-1/ENG/p4_2004-1.pdf

參考書目

1. Arendt, H., *The human condition*, 2nd ed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58. 林宏濤譯，《人的條件》，臺北：商周，二〇一六。
2. Clifford, J., *Museums as contact zones*. In *Routledge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*. 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97, pp. 188-219.
3. Duncan, C., *Civilizing rituals: Inside public art museums*. London: Routledge, 1995.
4. Friedman, T., *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: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*. New York: Farrar, Straus,

5. Giroux and Anchor Books, 2000.
6. Habermas, J., *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*.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, Darmstadt and Neuwied,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, 1982. 曹衛東、王曉珏、劉北城、宋偉杰譯，《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》，臺北：聯經，二〇〇一。
7. Harrison, M., *Changing museums: Their use and misuse*. London: Longmans, 1967.
8. Lavine, S. D., "Museum and multiculturalism: Who is in control?" *Museum News*, 68(2), 1989, pp. 36-42.
9. Lehrer, E., Milton, C., & Patterson, M. (Eds.), *Curating Difficult Knowledge: Violent Past in Public Places*. New York: Palgrave Macmillan, 2011.
10. Müller, K., "The culture of globalization," *Museum News*, 82(3), 2003, pp. 34-39, 62-63, 66-67.
11. Teather, J. L., "Museum studies: Reflecting on reflective practice," *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*, 10(4), 1991, pp. 403-417.
12. 吳敏人譯、Benedict R. O' Gorman Anderson 著，《想像的共同體：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》(Imagined communities: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)，臺北：時報文化，一九九九。
13. 李丁讚，〈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在台灣的發展〉，《公共領域在台灣：困境與契機》，臺北：桂冠，二〇〇四，頁一六二。
14. 阮新邦，〈批判詮釋與知識重建：哈伯馬斯視野下的社會研究〉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，一九九九。
15. 鄭邦彥著，〈一個亞洲·三個世界：我在博物館蒐藏與策展間的行動與反思〉，《博物館蒐藏的文化與科學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博物館，二〇一〇，頁111-115。